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分析

刘卫东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实验室, 北京 100101; 3.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049)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面临的重大危机, 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 包括人们的心理和生活、经济增长与就业、国家治理及世界治理等。这些影响使很多学者、评论家、大众、企业家乃至政府官员产生了非常悲观的情绪, 舆论中不乏经济全球化将终结、全球供应链将大规模调整、世界治理格局将彻底改变等言论。本文通过建立“全球化的三角结构”剖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 并结合疫情对世界的主要影响, 试图揭示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走势。我们认为, 资本的“空间出路”、技术的“时空压缩”和国家的开放程度是驱动经济全球化的三个基本力量, 这三者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结果影响着全球化进程。从动力机制看, 全球化是一个没有终点且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 它不会倒退, 而是波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 世界各国已经被全球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相互脱钩的代价极其昂贵, 没有国家会选择完全脱钩。所谓的逆全球化现象, 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格局变化及各国应对策略调整的结果。新冠肺炎疫情并不能影响全球化的资本和技术驱动力, 但是可能影响国家的开放程度。如果疫情持续时间不是很长, 经济全球化将很快会回归原有的发展轨迹, 继续进行调整。各国也将继续围绕经济全球化进行斗争、妥协、再斗争, 直至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 经济全球化可能因为应对疫情而踩下急刹车, 甚至暂退半步, 但很快将继续前行, 向着“包容性全球化”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化的三角结构; 世界治理; 全球供应链; 全球生产网络

DOI: 10.11821/dljy020200514

1 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面临的重大危机。截至2020年6月10日, 全球已经有200多个国家或地区发现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720万例, 死亡超过41万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疫情数据), 而且全球新增确诊病例未现下降趋势。疫情席卷了世界主要经济体, 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巴西、韩国等。为控制病毒扩散而采取的社交隔离和边境封闭措施, 为多数国家所采纳, 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 但也让很多国家的经济停摆、打乱了全球供应链, 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如此, 很多学者和专家预测在疫苗正式上市之前, 新冠病毒将持续威胁人类的健康, 而这可能需要一年以上的的时间。这一突发疫情让不少社会大众、学者、企业家、评论家乃至政府官员产生了非常悲观的情绪, 全球化终结等观点不绝于耳, 更有言论称疫情将彻底改变世界治理格局。

收稿日期: 2020-06-10; 修订日期: 2020-06-12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先导专项(XDA20080000)

作者简介: 刘卫东(1967-), 男, 河北隆化人, 研究员, 主要从事经济地理学研究, 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研究。

E-mail: liuwd@igsnrr.ac.cn

因此,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世界将何去何从,已经摆在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面前。未来的路如何走,不仅仅取决于疫情带来的客观而具体的影响,更依赖于我们如何认识这次疫情危机及其给世界治理结构带来的冲击。需要注意的是,在很多情况下,发展道路和方向是客观条件和主观意识共同决定的,社会建构和社会共识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社会舆论对此有显著的影响,无论这些舆论是自发的还是被政客刻意引导的。在此背景下,如何理性分析和看待疫情带来的影响,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未来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疫情仍在流行期间做出任何判断都是困难的。一方面,疫情何时及如何结束具有不确定性,则其影响也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人们的心理承受和变革预期也会随着疫情发展而变化,而这会影响社会建构的过程,影响公众舆论。本文通过解析“全球化的三角结构”并结合疫情的实际影响,试图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不会倒退,而是出现调整和波动,将朝着“包容性全球化”的方向继续发展。

2 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对社会经济系统产生着各种影响,包括社会、经济、全球产业链、国家治理和世界治理等诸多方面。媒体已经对这些影响进行了广泛的报道,评论家也给出了很多不同的解读。但是由于疫情尚在发展,我们还难以对这些影响进行系统的观察和总结,更不用说寻找相关文献了。而且,这些影响是暂短的还是持久的,也还没有办法进行科学判断。下面我们根据有关报道和评论进行一个粗略而简要的梳理,提取一些重要的影响。

疫情不仅仅使很多人患病乃至死亡,而且让整个社会陷入了巨大的不安,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行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由于短期内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社交隔离成为遏制疫情最有效的措施。中国的社区隔离特别是湖北武汉的封城措施,已经取得了良好效果,让本土确诊病例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基本清零。韩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国家的社交隔离措施(居家令)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但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在亚洲国家很少有反对社交隔离的声音,而在一些西方国家反对隔离的呼声和行动不断出现。而且,某些西方国家提出了通过大规模感染和小部分人死亡的方式来获得“群体免疫”的应对策略。这实际上反映出文化的差异,特别是集体意志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对立。从已有现象中可以看出,在不同文化背景和治理结构下,民众服从集体意志和政府管制的意愿有很大差别。尽管如此,总体上疫情还是让世界各地大多数人们意识到集体行为的重要性,未来集体意识将可能得到更多的认可。而且,世界也将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社会互帮互助的文化传统,而互助和合作是人类应对生存危机所必须具有的品德和智慧。

社交隔离也催生了人们新的生活方式。现代人类社会早已脱离了自给自足的时代,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工作都在实际上或心理上需要社会集聚(群聚)和面对面的交流。对很多人而言,居家独处从心理上就是难以接受的。而互联网所提供的非接触式交流渠道,为本次疫情期间居家隔离的人们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门,网购(包括跨国的)、网课、网会变得无比重要,甚至商品交易会也可以搬到网上去办。尽管网络购物已经流行多年,尽管视频会议也不新鲜,但是疫情期间人们变得高度依赖互联网,加快了向数字化和智能化社会发展的速度。实质上,这也是一种“时空压缩”,人们在不同的空间位置

通过网络和物流进行社会性群聚。尽管疫情之后这种生活方式是否会大规模延续还难以判断,但是它至少证实了一种生活的可能,而这种可能也会更多地融入到人们曾经习以为常的生活之中。

毫无疑问,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了强烈的短期冲击,而且有可能产生较为长远的影响。社交隔离意味着停工停产,边境封关意味着贸易停摆。随着抗击疫情的需要,各国轮番进入了“经济寂静期”,曾经拥堵的城市变得畅通无比,曾经人头攒动的商业街空空荡荡,高度依赖面对面交流的服务经济基本停止。截至2020年3月底,世界上最大的20个经济体都实施了社交隔离措施,而这些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0%以上。受疫情影响,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环比下降了9.8%(3月份环比下降了1.1%,显示了强劲的复苏)。同期,美国经济增长收缩了4.8%,但是多家机构预计第二季度美国将收缩34%。世界银行在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疫情将导致2020年全球生产总值萎缩5.2%¹⁾。高度依赖服务业的发达经济体受到的影响会更大,而中国经济则会出现逆势增长。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将下降13%~32%,其中价值链比较复杂的行业贸易下降幅度将更大²⁾。但是,需要看到的是,本次经济收缩是外部冲击造成的,特别是疫情防控因素导致的暂时性消费萎缩和生产停滞,与以往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不大一样。

当然,现实情况可能要比这些数字所表达的要残酷得多。如果经济收缩持续时间过长,这将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倒闭,产生严重的失业问题,也可能摧毁传统的商业联系和商业网络。而重新发展处于生产体系最底端的中小企业、恢复产业生态系统非一日之功。因此,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是增长速度下降看起来那么简单,有可能破坏整个产业生态和商业生态。相应地,疫情已经对全球产业链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目前主要集中在医疗防疫设备制造(如呼吸机)、汽车生产、电子设备及消费品制造等领域。这让部分学者和评论家对全球产业链产生了焦虑感,认为疫情之后产业链将发生重大调整。

疫情对国家治理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任何危急之时都是社会最需要政府代表公众采取集体行动的时刻,也是强化国家权力的时机,对于西方社会尤其如此。自新自由主义思想流行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权力已经大幅萎缩,而此次疫情则给它们加强政府权力和能力提供了机会,让政府可以实施战时管理和紧急措施。例如,2020年3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启动了《国防生产法案》,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进入了“战时状态”,政府可以要求企业按政府意志进行生产,而在平时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种危机管理措施是否会改变治理结构、推动政府与企业关系发生趋势性改变还有待观察。疫情控制较好的国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可能会增强,如德国;疫情持续蔓延的国家,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可能恶化,产生社会撕裂,如美国。借助疫情防控,政府还可以利用信息化和数字化手段实施更加精细的社会管理、安全管控和经济治理,让个人信息的应用合法化和常规化,促进国家治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此外,此次疫情也让所有国家意识到治理结构中应急能力的缺陷问题。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此次疫情对世界治理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远甚于对一国内部治理所产生的影响。“二战”后世界经历的历次危机中,主要大国、至少是一些大国会有某种程度的协调机制。而此次疫情发生后,中国之外的主要大国表现出高度的“自私”,几乎看不到合作的行动,而是以邻为壑。欧盟各国在疫情初期混乱而高度自私的表

1)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

2)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20_e/pr855_e.htm.

现,例如利用非常规手段争夺防疫物资,让人记忆犹新。美国这个曾经的世界治理领导者不但内部混乱、疫情大流行,而且拒绝承担世界责任,不断用“甩锅”来推脱疫情应对失误的责任,指责并停止资助世界卫生组织。这严重影响了世界各国应对疫情的合作,并把率先控制住疫情的中国摆在了一个“两难”的位置。如果中国积极承担世界责任,则被指责为借机取代美国的领导位置,别有用心;如果中国对此有所迟疑,则被批评为自私、借机制裁对手等。冷战之后世界还从未被如此撕裂过!

尽管我们可以认为2020年美国大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疫情防控的合作,但是事实是此次疫情完全暴露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存在了多年的世界治理赤字和治理危机。此前美国在拒签“巴黎协定”上一意孤行,与所有主要贸易伙伴搞摩擦,以及此次疫情中停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捐助,都没有得到其盟友的支持,反映出美国主导的世界治理体系已经出现危机,同时也反映了美国正在失去自信心。为摆脱困境、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美国存在不按常理出牌的可能,疫情危机可能会演化为其他危机,其他各国须有底线思维。可以说,疫情让世界治理结构的韧性减弱、脆弱性上升。在这个大背景下,很多学者和评论家认为逆全球化时代会不可避免地加速到来。

3 科学认识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 :全球化的三角结构

尽管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汇非常流行,但是它不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名词,人们对其的理解五花八门。全球化可以体现为各国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或者是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世界各地之间的紧密联系,抑或是公司的全球性经营以及世界市场的整合。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衡量,全球化带给人们的感受和结果是不一样的。例如,我们可能一方面以低廉的价格享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优质产品或服务,另一方面却抱怨产业转移带来了就业难题,而人们在心理上倾向于记住事情不利的一面。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全球化无疑表现为世界各地之间流动性的加强,各国之间生产、消费和市场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以及世界各地人们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大。总的来看,全球化既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趋势,也是一个社会建构的现象,社会整体观察的结果(如赞同、抗争或折衷)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全球化进程。也就是说,全球化是一个没有终点且不断变化的过程,必然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存在,而其发展将伴随着国家间权力的重构^[1]。

正确理解新冠肺炎疫情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需要科学认识其基本动力机制。在此前的研究中我们曾经强调过,经济全球化是制度、经济和技术力量共同作用下出现的一个历史现象,其中既包含有客观的动力、也涉及到制度因素^[2]。为更清晰地表达这种思想,我们建立了一个“全球化的三角结构”的理论框架(图1),提出资本的“空间出路”、技术的“时空压缩”和国家的开放程度是驱动经济全球化的三个基本力量,这三者的变化及其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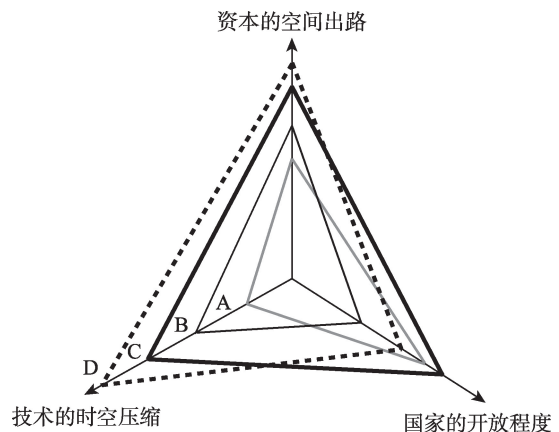


图1 经济全球化的三角结构

Fig. 1 The triangle structur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注: A: 殖民主义自由贸易时期; B: “二战”及“冷战”时期; C: 新自由主义时期; D: 后新自由主义时期。

相互作用结果影响着全球化进程。其中,技术进步带来的“时空压缩”和资本寻求“空间出路”的本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衰退的可能,而国家的开放程度在历史上就一直是在波动的,而且还将不断波动。因此,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受到国家开放程度变化的影响(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另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社会力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资本和技术的驱动力量,而后者与不同国家的治理结构密切相关。换言之,我们必须理解国家有多大的可能性或多大的空间来抵抗资本为逐利而寻找“空间出路”的本性,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时空压缩”。

资本空间扩张的本性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尽管存在质疑的声音,但市场化已经成为当下世界主要经济体共同承认和遵循的主要经济发展机制。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和资本追求利润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而为了获得最大利润资本必须不断寻找新的空间区位,从国内到国外进而到全球。过去两百多年中,这种资本寻找“空间出路”的运动从未停止过。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都从不同角度阐述并揭示了世界市场的重要性。例如,马克思认为国际交换是市场经济演化的必然结果,在运动中增殖是资本的天性,为延缓和克服经济危机资本一定会走向全球^[3]。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解释资本积累地理机制的学说,其核心概念就是资本的“空间出路”^[45]。哈维认为,资本积累离开空间扩张和空间重组难以维系,需要不断寻求“空间出路”;无休止的运动是资本积累的一个突出特点。

回顾过去两百多年经济全球扩张的历史可以看到,资本的“空间出路”从推动殖民主义自由贸易(图1中A,下同)到对外制造业和商业投资(B)^[6],再到国际金融市场上“剪羊毛”(C),一直没有停息过。目前,西方国家很多传统制造业企业已经转型为高度金融化的企业。与过去追求制造和销售利润的制造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相比,今天高度金融化的资本在“空间出路”上有着巨大差别。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各种离岸金融以及各种国际金融机构,已经让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紧密关联、高度相互依赖。2008年自华尔街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鲜明的写照。哈维认为,尽管资本形态发生了嬗变,但其本质和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资本的经济全球化“始终都要受到资本积累与投机变化无休止的转变活动的支配”^[7]。当我们通过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判断全球化波动之时,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丝毫没有退步的信号。事实上,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一直在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所以,我们必须清楚的是,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制造业的全球化,也是服务业的全球化,更是金融化资本的全球化。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生产方式的转变一直相伴而行。70年代的“滞涨危机”迫使西方企业不断调整生产方式,从过去的垂直一体化、大规模生产的福特主义方式,转向零部件“外包”、灵活生产的后福特主义方式。这使得供应链逐渐拉长,零部件生产的地区专业化分工愈来愈明显,催生了全球供应链和全球生产网络。跨国公司及其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的崛起,大大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一方面,世界贸易80%以上发生在全球生产网络之中^[8];另一方面,中间产品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大幅攀升,2018年这个数字已高达52%,在东亚内部更是高达70%以上。很多大型跨国公司已经发展出完整的全球生产网络,且对网络拥有重要的控制权。尽管它们的生产网络具有显著的地域嵌入性,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嵌入性是经济利益驱动的,与政治无关。另外一个现象是,在这个不断外包的过程中,以沃尔玛、家乐福、乐购等大型连锁超市为代表的商业资本崛起,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本形式和消费品市场霸

主,并打造了全新的全球生产网络(消费者驱动型)^[8]。

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必须要克服空间障碍,而技术进步带来的“时空压缩”让跨越空间组织经济活动的成本不断下降,为资本空间扩张提供了必要条件。在长途运输具有高风险、高成本、长时间特点的古代理,各国之间的贸易局限于奢侈品,而这根本谈不上什么“全球化”^[2]。现代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出现,让洲际运输时间和成本不断下降,并实现了即时通信,大幅度提升了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过去两百年以来,“时空压缩”的程度令人惊讶,时至今日人们对“地球村”已经习以为常了。帆船时代洲际旅行时间都是数月甚至一年之久(A),轮船出现后这个数字减少到数周(B),飞机出现后则减少到数小时(C)。19世纪末轮船的出现让洲际运输成本下降了70%以上(B),而20世纪60年代末集装箱技术的出现再次让洲际运输成本下降了70%以上(C)^[1]。今天,将一个标准集装箱从中国运输到欧洲仅仅需要2000多美元。假定一个集装箱的货值为10万美元,这样的运输成本几乎已经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

此外,从电报、电话、传真到互联网和移动通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让信息获取实现了极致的“时空压缩”。一方面,当今世界人们已经习惯于即时获取各地信息,生活高度依赖信息的全球化;另一方面,所有通过互联网可以交换的数字化工作,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无比自由的流动了,推动了服务外包的兴起和服务业的全球化。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提出了“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思想,并预见到资本会追求把一个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9]。因此,我们需要清楚,强大的“时空压缩”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更是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只要市场经济机制存在,“时空压缩”就会持续,就会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世界各国的开放程度。在闭关锁国的时代、在冷战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非常有限,甚至称不上全球化。在世界主要国家都支持开放政策的情况下,才有了过去四十年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国家是否采取开放政策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与世界治理结构密切相关,也与流行的经济学思想有关。最早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是殖民主义时期的英国^[10];当时的英国既拥有最发达的制造业,也拥有最广泛的殖民地体系,大量殖民地国家被迫采取了自由贸易政策。当今的世界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各国在法理上拥有决定本国事务的绝对权力,包括经济政策。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各国的经济活动已经相互嵌套,除非发生极端情况如世界大战,国家的政策空间绝不是一个自由空间。当然,主导世界治理的霸权国家如美国,确实拥有很大的自由度。另外,作为国家机器,一国政府的行为也需要均衡国内各种势力的诉求(包括资本的和公众的),在选举政治国家更是如此。这正是一些国家选举口号与执政行动之间存在差别的原因。此外,为解决经济危机,西方国家长期经济政策一直在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之间摆动,也影响着其开放程度^[6,10]。

总体上,在“全球化的三角结构”中,国家开放程度的波动是最大的,历史上就是如此^[2]。19世纪末到“一战”之前,资本和劳动力均可自由流动(A),被称为自由主义的黄金时期;之后受战争的影响,流动性大幅度下降。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内部开放程度逐步提高,但相互之间缺少交往(B)。“冷战”之后世界才迎来了开放的另一个黄金时期(C)。但是,由于资本的“空间出路”和技术的“时空压缩”共同作用,即使是在世界开放的收缩期(即“二战”及“冷战”时期),各国交往的规模和深度也远高于19世纪。因此,从历史的角度和动力机制看,国家开放程度影响着但并非决定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它给全球化带来不确定性。

4 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疫情发生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2016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出现的反对全球化持续升温的阶段。很多学者和评论家将疫情的影响叠加到已经发生的反全球化现象中,表达出各种各样的担忧,提出全球化终止或全球供应链大调整的观点的人不在少数。疫情会不会成为压倒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呢?我们认为,科学判断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既需要正确理解逆全球化的现象,也需要认识疫情对全球化动力机制的冲击。

事实上,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声音从未停止过。即使是在全球化最受推崇的20世纪90年代,抗议全球化的行动也时常出现在西方各大城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办的相关会议,经常会遇到抗议活动。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迅速上升,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思潮和行动。英国脱欧、美国“退群”^[11]、贸易摩擦和非贸易壁垒增加、多国右翼党派执政,这些现象已经不需要在这里进行一一介绍。相应地,近两年研究逆全球化的文献迅速增长。目前,多数学者将逆全球化归结为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和危机,特别是过去四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了严峻的贫富差距问题^[2,10-15]，“输家”多、“赢家”少。正视并纠正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化继续前行的前提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要倒退,而是方向调整,向着更加普惠、均衡和包容的方向发展,即“包容性全球化”^[2,6]。很多所谓的逆全球化现象应该被理解为方向的调整,而不是开倒车。例如,英国脱欧不能说明英国即将闭关锁国、不再实施开放的经济政策。

逆全球化也是一些发达国家国内问题国际化的表现,例如移民政策、经济政策和社保政策等方面的失败,其核心因素是为了选举而更加注重选民的短期诉求,一定程度上或者在口号上放弃长期获利政策。有国外学者提出了“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假说”,即一国政府同时仅能选择全球化、政策主权、民主政体(选举政治)三个目标中的两个^[16]。这个假说或许可以解释美国的特朗普现象。此外,我们也要看到,对于美国而言,逆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被作为遏制中国崛起的手段。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逆全球化行动只不过是推动让自己获利更多的新全球化,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经济色彩。但是,无论是内部问题外部化、还是将逆全球化作为地缘政治经济工具,都不会让发达国家关上开放的大门,而是要手腕、设门槛。这些国家更清楚自己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多大的利益^[17],经济与政治毕竟不同。因此,所谓的逆全球化最多只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短期策略调整,属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正常的波动现象。

毫无疑问,疫情对全球化过程或逆全球化现象产生着影响。舆论和评论家们关心最多的有几点。第一,世界各国都面临抗疫物资短缺的问题,高度依赖进口,应该自给自足;第二,由于社交隔离,一些全球供应链被打断,需要大规模调整供应链;第三,由于上述两点,疫情可能会被当作保护主义的挡箭牌和政治工具(甩锅)。当然,也有报道称一些企业家由于疫情改变想法,声称不再以赚钱为核心目标。疫情期间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市场竞争中企业或资本如果不盈利,就只有失败。整体而言,疫情改变不了资本逐利和寻求“空间出路”的本性。此外,疫情也改变不了技术进步带来的“时空压缩”。如前所述,事实上疫情期间人们更加依赖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了。因此,我们认为,疫情像踩了一脚急刹车一样,暂时影响了各国的开放程度,对全球化产生了某些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影响,包括人们在疫情期间由于恐慌或误导而形成的社会舆论,以及

别有用心的政客的政治化利用。

抗疫物资寻求自给自足会导致逆全球化是一个伪命题。疫情爆发是一个极短时间内出现的危机事件, 抗疫物资的需求会突然出现数百倍的增长, 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可能马上应对这样的需求增长。即使是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 在疫情爆发的最初一、两个月, 口罩也是“一罩难求”。这实际上是一个应急储备问题, 而非生产问题。事实证明, 防疫物资的国际贸易除了早期有一些混乱之外一直保持畅通, 而早期的混乱如果有良好的国际合作机制本应可以避免。一个国家长期保持满足疫情爆发所需抗疫物资的生产能力, 在经济可行性上是不可想象的。目前, 中国口罩生产能力大幅过剩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可以预见, 疫情过去之后, 在短时间内大多数人就会放弃这种想法, 转向关心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应急储备能力。此外, 我们也要清楚, 抗疫物资仅占世界商品消费极小一部分。

疫情将导致全球供应链大调整的说法则是夸张的判断。首先, 本次疫情席卷全球, 无论零部件生产在哪里, 无论是本地生产还是海外采购, 供应链或早或晚都会受到影响。当疫情早期在少数国家爆发时, 这种观点似乎有些道理, 但是当疫情蔓延至全球后, 疫情的影响已经均一化了, 供应链的变与不变没有太大区别。其次, 全球供应链是过去四十多年市场机制驱动的逐层“外包”慢慢形成的, 是全球生产网络深度发展的表现, 其背后有强大的市场运行规律。供应链上的各个环节不是棋盘上的棋子、可以被拿来拿去, 而是全球生产网络上的结节, 其空间调整有着自身的规律和节奏。按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 大概每40年左右会出现一次大范围的空间转移。事实上, 近年来部分低端制造业已经开始从中国向外转移。我们无法完全否认疫情可能会影响这种空间转移, 而且截至目前也没有来自企业界的统计数据, 但是我们认为市场规律仍是主导机制, 疫情的影响有限。在这方面, 公众和媒体似乎存在认识误区, 即只要是制造业流入中国就是全球化在发展, 流出中国就是逆全球化了。

尽管疫情对全球化的资本动力和技术动力很难产生影响, 但是在一些国家它可能被政客利用, 成为国内选举和国际地缘政治经济竞争的工具, 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家的开放程度。最近, 美国的“甩锅”行为以及一些西方别有用心人士的“索赔”闹剧, 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反映。这种抹黑口号很难影响到企业家行为, 但是很容易鼓动公众, 误导疫情影响的社会建构。由于应对疫情的失误及其国际领导力的下降, 美国极有可能把疫情作为其调整全球化策略的一个借口, 特别是在2020年大选期间。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尽管资本不会完全听从政治家的指挥, 但是法律和行政措施(如制裁)以及公众的压力会迫使企业让步, 从而做出某些有限度的调整。

但是,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不存在与全球化脱钩的可能性。现在西方社会的消费、生产和服务都是建立在离岸外包的基础上的^[17], 这些国家的经济生活和大众生活已经与经济全球化融为一体, 难以脱钩。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 全球化让这些国家的消费者享受着价格低廉且品质优良的消费品。联合国贸发会的研究表明, 以美国的零售价格为基准, 在1986—2006年期间服装, 鞋类, 纺织品, 家具, 杂项制造(包括玩具)和化学品的平均进口价格下降了40%^[17]。而大量消费品价格的下降所产生的效应可能超过了低收入人群工资相对下降的效应。如果与全球化脱钩, 最先感受到生活压力的一定是这些低收入人群, 引发社会动荡, 影响到选举。因此, 一些国家即使可以借助疫情实施反全球化措施, 也只能是象征性或策略性的。全面反对全球化, 等同于拆掉自己经济体系和社会生活的地基。

总体上, 我们认为近年来所谓的逆全球化现象, 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格局变化

及各国应对策略调整的结果。全球化已经让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各地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显著提升,并通过互联网实现了高度的相互了解。任何国家要与全球化脱钩,其代价都是非常高昂的。除非出现世界大战那样的巨大冲击,否则这种全球化的紧密联系很难被打破。所谓的逆全球化都是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短期策略调整,而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也将是暂时性的和局部性的。

5 小结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犹如巨石落水,在世界范围内溅起了浪涛和涟漪,冲击着各国的社会经济体系和人们的正常生活,也考验着人们良知和集体意识,更是凸显了世界治理的危机和无奈。在一个极其需要国际合作的时刻,世界没有看到美国这个曾经的领导者发挥积极作用,而是为推脱责任进行各种“甩锅”。这次疫情中,世界治理体系也“生病”了,变得更加脆弱,亟需改革和完善。当然,疫情也让西方各国有机会强化政府能力,提高数字化和智能化治理程度,而这有利于提升国际合作水平。另外,虽然疫情对世界经济的短期冲击巨大,但是如果持续时间不长将不会对经济结构产生过大的伤害。当然如果持续过久,疫情将伤及产业生态,产生长期影响。无论如何,疫情中发生的各种现象让人们在经济全球化产生了焦虑,不少人担心经济全球化将终结或倒退。

全球化是一个没有终点且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它不会倒退,而是波动。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会发生权力重构。为适应世界格局变化,国家采取短期适应性策略是正常现象,不应视为逆全球化。在一个已经全球化的世界中,每个国家想要完全与全球化脱钩的代价都是巨大的。美国的特朗普现象并非逆全球化,而是推动让自己获利更多的新全球化,从而遏制中国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经济竞争色彩。但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确实带来了突出的贫富差距问题,需要纠正偏差,让全球化惠及更多的地区和人们。而这也不是逆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的改革和方向调整。

从“全球化的三角结构”来看,疫情并不能影响全球化的资本和技术驱动力,但是可能影响国家的开放程度。一方面,现阶段的抗疫工作确实导致很多国家暂时关上了大门;另一方面疫情可能被当作政治工具,诱导民众的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但是,世界主要国家都已被全球生产网络紧密连接在一起,很难相互脱钩,反全球化的口号和行动更多地是象征性和策略性的。可以预见,如果疫情不会持续过久,后疫情时期经济全球化很快会回归原有的发展轨迹,继续进行调整。各国也将继续围绕经济全球化进行斗争、妥协、再斗争,直至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也就是新的国际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形成。因此,经济全球化可能因为疫情而踩下急刹车,甚至暂退半步,但很快将继续前行,向着“包容性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全球化不会终结!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Dicken P. *Global Shift* (6th Edition). London: Sage., 2011.
- [2] 刘卫东.“一带一路”——引领包容性全球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Liu Weid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Pathway Towards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2-33, 169. [Marx K, Engels F.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8).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32-33.]
- [4] Harvey D. *The geography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Marxian theory*. *Antipode*, 1975, 2(S): 9-12.
- [5] Harvey D. *The spatial fix: Hegel, Von Thunen and Marx*. *Antipode*, 1981, 13: 1-12.

- [6] 刘卫东, Michael Dunford, 高菠阳. “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构建: 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包容性全球化.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11): 1321-1331. [Liu Weidong, Michael Dunford, Gao Boyang.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neoliberal to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7, 36(11): 1321-1331.]
- [7] 戴维·哈维. 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 阎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427. [Harvey 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Yan Jia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427.]
- [8] Coe N, Yeung H W C.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eoriz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 Interconnected Worl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6卷下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33. [Marx K., Engels F.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46)*.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0: 33.]
- [10] Sheppard, E. *Limits to Globalization: Disruptive Geographi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11] 张晓云, 李成威, 高丰, 等. 美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 过去、现在与未来. 财政研究, 2019, (12): 110-119. [Zhang Xiaoyun, Li Chengwei, Gao Feng, et al.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ublic Finance Research*, 2019, (12): 110-119.]
- [12] 任晓聪, 和军. 当代逆全球化现象探析. 上海经济研究, 2019, (4): 110-117. [Ren Xiaocong, He Jun. An enquiry into the anti-globalization phenomenon. *Shanghai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9, (4): 110-117.]
- [13] 张超颖. “逆全球化”的背后: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及其批判. 当代经济研究, 2019, (3): 66-72. [Zhang Chaoying. Behind anti-globalization: Neoliberalism crisis and its critiques. *Contemporary Economic Research*, 2019, (3): 66-72.]
- [14] 杨万东, 张蓓, 方行明. 逆全球化的历史演进与可能走向. 上海经济研究, 2019, (1): 99-112. [Yang Wandong, Zhang Bei, Fang Xingming.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possible trends of anti-globalization. *Shanghai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9, (1): 99-112.]
- [15] 张刚生, 严洁. 论美欧发达地区的逆全球化现象. 国际观察, 2020, (2): 124-156. [Zhang Gangsheng, Yan Jie. On the Phenomena of deglobalization in the developed regions of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Review*, 2020, (2): 124-156.]
- [16] 佟家栋, 何欢, 涂红. 逆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开启.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2): 1-9. [Tong Jiadong, He Huan, Tu Hong. Anti-globalization and initiation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Nankai Journal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0, (2): 1-9.]
- [17] Smith J. *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13, 28, 35.

The impacts of COVID-19 pandemic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IU Weidong^{1,2,3}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considered the biggest crisis confronted with the worl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which has brought huge impacts on people's health and daily life,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as well a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creasing pessimism is buzzing among scholars, critics, entrepreneurs, the mass and even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views like the 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arge-scale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fundamental change of the world economic governance structure are becoming prevailing on the media. This paper tries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by developing a framework of globalization's Triangle Structure to understand its dynamics in addition to a summary of the ongoing impa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We argue that the spatial fix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time-space compression led by technological advance and openness of nations are the three major driver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of these three drivers decid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rom such a dynamic viewpoin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an ever-changing integration process without an end but constant fluctuations. The cost of decoupling of nations from globalization would be very huge because they have been highly integrated by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rade networks and no nation can afford a complete decoupling. The so-called de-globalization phenomena are just short-term adjusting strategies of nations to cope with power reconfigurations brought b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pandemic will have little impacts, or probably nothing, on the spatial fix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ime-space compression led by technological advance, but may temporarily influence some nations' openness. If the pandemic does not last lo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ll resume from the shock soon after the world goes back to normal, and develop and restructure according to its own dynamics. Thus, we tend to believe the pandemic at most slams the brake of globalization and would not be able to put it into revers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ll not stop or reverse, but develop towards a more inclusive stage.

Keywords: COVID-19 pandemic; globalization's Triangle Structur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global supply cha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